

楚唐
著

梦 花 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花梦树

楚唐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编 审：刘 明
责任编辑：程 翔
封面设计：周 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花树 / 楚唐著.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80709-117-2

I. 梦... II. 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2534 号

梦 花 树

楚 唐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彩帝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5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80709-117-2 定价: 25.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

六年前，我回到了母校，位于湖北西南部山区的建城一中。

我没想到大学毕业后会回到这里，一点也没有想到，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四年前离开这里时，我曾经怀揣那么多理想，衣袋里、裤袋里、脑袋里全是。我以为自己终于能展翅翱翔了，可还没有飞多远，我就像一只被人射中的雄鹰，啪地一声掉到地上，来不及挣扎就奄奄一息。

人的一生要么与命运抗争，要么接受命运的安排。既然自己的表演并不精彩，就不要老是赖在舞台上不肯下来。我从学校商店的王老头那要来几个大纸箱子，把从大一起买的一百多本书塞进去，坐长途汽车悄然离开了学校。当时王老头问我分到哪儿啦，我都没有回答。我装作没有听见，径直提出了我的要

求：我要三个纸箱子。王老头翻箱倒柜了半天，才找出两个。我看这两个箱子够大，就说，两个就行了。我一手拿一个箱子，转身就走。王老头在后面喊：以后要是回学校的话，到我这里来坐一坐。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同宿舍的同学不是留在了武汉，就是去了广州、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心情自然跟我不一样，应该留下来好好谢一谢幕。我来自贫困山区，应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谢绝了室友送我去车站的好意，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之后，登上了武汉开往建城的长途汽车。

无论是从建城到武汉，还是从武汉到建城，这都是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我之所以选择长途汽车，除了考虑到途中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免去了先坐火车到宜昌，再转乘汽车时上上下下的麻烦，此外最重要的，那就是坐长途汽车最单调。对于此时的我来说，越单调的生活越适合我此时无聊甚至绝望的心情。这个原因反过来说可能更为合理：由于我此时破烂不堪的心情，所以我选择了单调的长途汽车。因为坐长途汽车，中途不需要跟任何人打交道。二十多个小时中，可以不用说一个字。除了吃饭撒尿之外，中途也不需要下车。坐船实际上也很无聊，可是四年前我第一次去武汉时，从巴东坐了三天两夜的船，居然感觉意犹未尽。

此时，我的心情前所未有的沮丧。

汽车是下午一点左右离开武汉的，在江汉平原上马不停蹄地跑了四五个小时之后，黄昏时分抵达大巴山东麓的宜昌。过了宜昌，汽车驶入了漆黑一片的大巴山区。昏睡了一个下午的我此时变得格外清醒，连汽车什么时候进入鄂西地界我都知道。进入了鄂西地界就进入了武陵山区。汽车在黑黝黝的武陵山区蜿蜒穿行的这几个小时里，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了自己的梦想，我曾经有很多梦想，比如在大学里做个文学教授、在杂志社做个编辑、在省级报社或电视台做个记者等

等。我的梦想很多，惟独没有想到回中学母校做个语文老师。四年前，我坐在高三（2）班的教室里，思绪常常翻山越岭，飘到了千万里之外。十六七岁的我心比天高，几乎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望。那时的我，学习成绩在整个年级的三百余人中名列前茅，什么“三好生”、“优秀班长”之类的奖励我都不记得到底得过多少回。语文老师不仅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念给我们班的同学听，还常常念给他带的另一个班的学生听。尽管我来自几十里路以外的农村，尽管我说话时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尽管我的穿着和长相完全不能与那些来自县城的同学同日而语，但我确实有无穷的魅力。只要我愿意，班上的任何一个女生都愿意跟我交往。那时的我，别说走出湖北西南部的这片崇山峻岭易如翻掌，就是走向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国都不是件难事。

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尽管刚刚过去，却恍如隔世。大学生活的一点一滴此时都显得弥足珍贵。它曾经也是我的梦想啊。在这沉沉的夜色之中，汽车每翻过一座高山，我跟我的梦想之间就多了一道屏障。汽车穿越了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的千山万水之后，我曾经的梦想就被锁在了千里迢迢的大山之外，即使在心里重温一遍都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第二天上午汽车到达建城时，我终于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我又回到了山里。

我爹妈的心情与我完全不同。得知我分配到建城一中时，他们不辞劳苦，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来到位于建城城关镇南的建城一中。他们在校园里转了几圈，又在大操场旁的石凳上坐了一个多小时。

我爹坐在石凳上一边抽烟，一边欣慰地对我妈唠叨个不停：“我们家终于有人吃国家粮了，能把自己每年上缴的公粮吃回来一些了。”

我妈也欣慰地说：“我们以后来城里就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吃国家粮、在城里工作是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他们就像

卫星，在建城周围的大山里折腾了几个世纪，一直未能找到通向县城的路。以我这样一个到过大城市的人的眼光来看，他们那是瞎折腾。实际上，在山里的任何地方都一样，地里不长庄稼就没有饭吃，山上不长树木就没有柴烧，自己不动手盖房子就没有地方住。尽管如此，每次战乱，他们还是不得不拖儿带女地四处迁徙。现在向家终于有人走进了县城，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为此，我爹我妈到祖坟上烧了一个月香。

汽车到达建城后，我把那两个纸箱子朝初中同学童德的宿舍里一扔，到一中报到之后，就赶到汽车站，登上了开往长乐的汽车。我在下坝农场下车，又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在野鸡和猫头鹰毛骨悚然的叫声中，回到了离开才半年的家。四年中，我每年寒暑假都回来。他们就我一棵独苗，如果我不回去，夏天他们就会像树上、庄稼上的知了那样，孤单地叫着“红兵”的名字，鸣叫整整一个夏天；冬天他们就会像山顶上的积雪，望着我回来的必经之路，眺望整整一个冬天。整整四年，我一次也没有让他们夏天忧愁得像个知了，冬天孤单得像山上的积雪。我愿意在一年中的冬天和夏天这两个季节，让他们的脸上呈现出春天的景色，处处花团锦簇。

我家虽然在大山里，但由于我妈的娘家相当富裕，再加上我妈的爹妈只有她一个独生女，而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独儿子。所以，与那些有几个孩子的家庭比起来，我们家的条件简直是好到了天上。按说，像在我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一定非常任性和目无尊长，可是我不，我从小就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特别善解人意，但也特别敏感。隔壁左右的人都非常喜欢我。我每个寒暑假回来，他们都要来看我，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来。我一回去，杨扎营村就像过节一样。要知道，我是这惟一一个大学生，知名度在所有的影视明星、政坛新秀、风云人物中名列第一。现在我学成归来，村子里的人在喜欢我的同时，对我更多了一份尊敬。他们常问的一句话是：“向老师，你回来了？什么时候走啊？”他们常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一句话

是：“快叫向老师。长大了也像向老师那样，考上名牌大学，到城里工作。”

我爹和我妈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最远也就是小垭门——从我家走到县城以后，还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我妈有一个远房表亲住在那里，每年过年都要走一趟。我第一次去时大概才八岁，都走哭了，主要不是脚累，而是心理上的抗拒。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县城应该是任何一趟爬山涉水的终点。可是这次走到热闹非凡的县城之后，我们没有驻足享受一下城市的繁华，而是穿越这片繁华，继续朝荒山野岭中走去。我有点受不了了，就哭了起来。我妈说：“你再哭我以后就不带你出门了。”我怕他们以后真的不带我出门了，就把声音放低了一些，但我心里又实在很委屈，所以就一直低调地保持着这条发泄委屈的渠道，一路哼唧不止。

别看我妈没读多少书，关于生活的道理她比那些傻博士懂得都多。她并没有阻止我的哼哼唧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并没有因为哼哼唧唧而停止向前的脚步。尽管我走两步，他们只需要走一步。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妈也懂得开水壶的原理。如果把所有的口子都堵死了，连出气小孔都不留，我的哭声虽然没有了，但我肯定会爆炸。我哼一会，不哼一会。不哼的时候，我发现这崇山峻岭之中除了我爹、我妈和我的脚步声之外，一点声响都没有。如果一定要再找点什么声音的话，那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喘气声。

我就这样一边哼着，一边机械地朝前走。我爹拿着手电筒，走在最后。山里人夜路走多了，总结出这么一条规律：“前照一，后照齐。”就是说，走在最前面的人拿着手电筒或者火把的话，只能照他一个人；而如果手电筒或者火把是走在最后的那个人拿着的话，就能够照到前面所有的人。不知道是我爹眼里只有我妈，还是电池快用完了，我眼前始终只有一片摇曳不定的昏黄。幸好我八岁时才一米多一点——作为男孩子，太矮了点。但矮也有矮的好处：首先，摔

交的时候不会很疼；其次，用脚不能走的地方，可以毫不费力地借助手的力量。我记不清那天晚上到底摔了多少次跤。我摔跤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我爹偏心，我前面确实一点光亮都没有。其次是我故意用摔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我八岁的时候，摔跤就跟呼吸一样顺畅自然，可我妈看着心疼，实际上我自己一点事都没有。再次是因为哼哼唧唧占用了我很精力。有时候我会闭着眼睛哼，所以摔跤就在所难免，连平路上都会摔跤。

就在我以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走出这条黑色隧道时，我们终于听到了狗的叫声。它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山谷里回荡。尽管我讨厌狗，更讨厌它的叫声。但这时候不一样了，那总算是离人类最近的一种声音了，比猫头鹰和野鸡的声音亲切多了。特别是当我听见我妈说“到了，听到狗叫了”的时候，我简直觉得狗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了。

第二早晨，我站在亲戚家的场坝里，向山下眺望。这里的山比我们家周围的山更多，而且，山山相连，一望无际。这些山的高矮大小都差不多，仿佛孪生兄弟。昨晚来时的路好像并没有跋涉时的那般险恶，在山脚下可爱地蜿蜒而去，一直延伸到乳白色的天边。

这次小垭门之行对我影响很大。八岁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的终点就是县城，没想到，县城的背面还有那么多山，比自己房前屋后的山还多；县城的背面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在这个世界里艰难地跋涉。

所以，我妈尽管出过“远门”，但视野并没有因此而开阔多少。但是，在她一生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中，她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与才华。

二

大学班上的同学发现我表格上的“民族”一栏里填的是“土家族”时，都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我：

“你是土家族？”

为了模糊我和我可爱的同学们之间的界限，也为了减轻他们的吃惊程度，我轻描淡写地说：

“实际上，我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差别。我上中学时才知道自己是土家族。”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问：

“那，你们少数民族有什么风俗习惯没有？”

我实话实说：“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在得知自己是土家族之前，一直以为我和我们村子里的人过的就是汉族人的生活，包括生老病死等等。我跑到学校图书馆查阅了一些书籍之后，才发现土家族确实有它特殊的生活习俗。我在书上读到的关于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饮食习惯、生活起居、服饰禁忌都跟我二十年来所经历的大致相同。

我曾说过我妈充满了智慧和才华，这是名副其实的。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会认同我对我妈的这个评价。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每家每户如果不生好几个孩子，简直就不算中国人，好像没能力似的。尤其是在农村，两个是最低标准。一般家庭都不可能只生两个，除非生不出来。很多家庭都要生四个、五个，甚至七八个，我还听说过生十一二个的，就像下猪仔似的。而我妈呢，生我的时候才二十岁。她把我生下来之后，未经我爹同意，就宣布不生了。日子久了，我爹对“干打雷不下雨”的情形不满意了。

他对我妈说：“起码再生一个。”

“不生！”

我妈不仅口头上严厉，行动上也不手软：每次同房，必须采取措施，或者体外解决，否则让我爹三月不知“肉”味，仅靠梁上的余音过日子。我妈从来不通过自己吃药解决。因为在她看来，这样对身体不利。这些都是我瞎编的。我所知道的是我妈从来没有上医院刮

过宫，流过产。这一论断的依据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妈提这两个词，哪怕是说漏嘴都没有。在我妈抱怨我爹的言语中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至于有没有通过吃药解决，我断定没有。依据是，即使我妈的娘家殷实富足，但在七十年代的大山里，她是绝对买不到壬苯醇醚之类的避孕药的。

我爹先是把他的妈，就是我奶奶，搬来做工作，但我妈丝毫不为所动。我奶奶走后，我妈冷淡了我爹一个星期，既不跟他说话，也不许他碰她。我爹那时才二十五岁，正是强劲亢奋之时，实在憋不住了，就主动跟我妈讲和了。我妈让我爹保证，今后不得再提“再生一个”的事情。我爹没有做声，我妈心想，要这样一个大男人转变思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再说，生孩子也并不像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说的，有个星期天就能生出来的。于是就跟我爹讲和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爹又旧话重提，把大伯、二伯、大姑、二姑、三姑、四叔轮流请到我们家给她做工作。这次我妈冷淡了我爹一个月，不仅不跟他说话，还不跟他同榻而眠。理由是儿子大了，床小了，三个人睡不下。一个月后，我妈觉得火候到了，才开始搭理我爹。我爹毕竟是男人，见我妈冷若冰霜的脸解冻了，就跟我妈和好如初了。自那以后，我爹就再也没有提过“再生一个”的话题。

真可惜我爹的一腔热血和满腹精华啊，他这辈子就我这么一枝独秀。

这些都是我问我妈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时，我妈告诉我的。她对我说：“妈就你这么个儿子，你要给你妈挣口气；妈之所以只要你这么一个，是希望把你捧（“培养”之意）出来。儿子多了有什么好？看你奶奶，把儿子养大了，一个个都跟着媳妇跑了，自己却没人管了。媳妇过门才几天就闹着分家，多个儿子多个仇人一点都没说错。”

真感谢我妈二十年来给了我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教育，否则我怎么可能有今天这样壮硕如牛的体魄和位及人师的学识呢。

顺便说一句，由于我妈是向家的独生女儿，她可以在家里招赘。也就是说，让我爹做上门女婿。听我家爷（念“gāyē”，方言，“外公”之意）讲，以前，上门女婿要跟女方姓，按照女方的派行，或者辈分改名，但可以保留原来姓名中的一个字。比如：我爹叫罗福成，我妈叫向依娴，现在我爹做了向家的上门女婿，他就应该改为向依什么，比如，可以是向依福，向依成，也可以是向依加一个别的字。我家爷说，现在是新社会，上门女婿可以不改姓了，但所生子女应随母姓，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随爹姓罗而随妈姓向的原因。

从上面这个例子，不难看出我爹和我妈性格方面的差异。凭我二十二年来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的性格大致有如下特点：我爹表面坚强，内心却十分脆弱；我妈表面脆弱，内心却无比坚强；我爹沉默寡言，我妈活泼开朗；我爹谨小慎微，我妈泼辣干练；我爹笨手笨脚，我妈心灵手巧；我爹表面上对我宽容，内心里却对我寄予厚望，我妈表面上对我严格，内心里却生怕我受了一点苦。除此之外，我爹和我妈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爹看起来人高马大，却三天两头生病。山区气候潮湿，我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患上了支气管哮喘。据他自己说，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这个毛病，每年一到春秋季节，胸部便有压迫窒息感，咳嗽不止，继而出现呼吸困难，严重时，喉部呼呼作响，仿佛有千军万马奔驰而过。我爹的这个毛病也跟他们兄弟姊妹太多有关。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山里人的生活本来就苦，家里人一多，生活就更苦。我爹告诉我，他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冬天不仅没有棉鞋，而且连棉袄都没有。我爹还告诉我，他爹生前是个壮劳力，力气很大，饭量也很大，一顿可以把全家人的口粮吃完。可他为了省下口粮给我爹他们兄妹吃，自己却活活饿死了。爷爷被饿死时，我爹才几岁。看到我爷爷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我爹还懵懵懂懂的。我每次听到这里就觉得不可思议，我为我爷爷的精神和勇气而感动，我深深地感谢我爷爷，感谢他牺牲自己来挽救我爹，从

而也挽救了我。

与我爹截然不同，我妈看起来矮小瘦弱，却从来不吃药，即使感冒也从不吃药，扛一扛就过去了。我妈对我爷爷这辈人的情况不一定了解，但我爹、伯伯、叔叔的生活却非常熟悉。也许正是因为看到我爹一家人过着苦难深重的日子，她才坚决不同意我爹要第二个孩子的请求。不管罗家给她什么样的脸色，她都义无反顾。

我爹和我妈性格如此迥异，我不知道他们当年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爹，我爹说了一句“你问这个干什么”，便继续劈柴。我爹说不说，我都知道，在杨扎营村，任何人结婚都免不了提亲、定亲、报期、发亲和圆房这套繁文缛节。当时我还不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特有的风俗习惯，以为所有的中国人结婚都这样。

尽管我爹沉默少言，但看得出来，他对我妈和我是非常满意的，特别是当他看到我的几个伯伯和姑姑家日子过得越来越苦，生活越来越不舒心的时候，他就从心底感激我妈的先见之明。我考取大学后，他的脸仿佛整天都泡在笑容里。虽然他不善表达，但处处以实际行动体贴我妈，关心我妈。天冷了，他轻轻地给她披上一件衣服；天热了，他拿起大蒲扇就给她扇起来。她要是天黑了还没有回来，他就会到村口去等，一直等到她回来。

表面上我跟我妈似乎交流很多，但实际上我跟我爹最是心心相通。每年快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我爹就在我回来的必经之路上来回徘徊。有好几次我快到家时，都看见他在落日的余晖中举目眺望。老远地，他就看见我了，然后朝我疾步而来。我说：“您怎么在这里？”他说：“我估计你这几天要回来了，就出来看看。”有一年寒假，我爹居然到建城长途汽车站去等我，还真的被他等到了。我说：“我又没告诉您，您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他憨厚地笑笑，背起我的行李就走。

我对我爹说：“我差点在槐子坦下车了。”

我爹说：“你在槐子坦下车我就接不到你了。”

我说：“您接不到我准备怎么办呢？”

我爹说：“那我就一个人回家。”

我爹几乎跟我一样熟悉我回家的路线。我每次回来，总是先坐火车到宜昌，然后买一张第二天清晨开往建城的汽车票；买好汽车票后，找一家最便宜的招待所囫圇地睡一晚；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到建城，六七点钟即可到家。我上学的路线我爹也了如指掌：清晨从建城坐长途汽车到宜昌，下车后立即转乘开往武汉的火车，到学校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

最麻烦的是每次上学，凌晨三点多就要起床，五点多六点之前必须赶到城里，这样才能赶上六点半开往宜昌的汽车。我爹我妈也曾问过我：“要不要到城里住一晚上？”我说：“不用。”我知道他们挣钱不容易。

三点多起床，夏天还好一点，冬天就有点惨兮兮的。起得早，天气冷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爹伫立在清晨寒风中孤瘦的样子总是让我那么担心和不舍。在我印象中，我每个冬天上车去学校时，整个建城都笼罩在一片死寂的浓雾之中。清冷的灯光星星点点，带着沉沉的睡意，伫立在街道两旁，担负着点燃白天的重任。

车灯打开时，两束强光刺透黑暗，开凿出一条昏黄的通道。通道里飘着雾气和大山里刺骨的寒气。汽车仿佛没有睡醒似的，东倒西歪地上路了。车子一出县城，便开始爬坡，一爬坡就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嚎叫，响彻县城寂静的上空。我看看窗外，看看脚下的建城，思绪万千，愁肠百结。我怀疑那撕心裂肺般的嚎叫不是从汽车里而是从我心底迸发出来的。我分明看见我爹形单影只地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双眼紧随车灯目送着我。我一想到要半年后才能见到他时，心里就凄凄然。

我不知道我爹将如何打发天亮前的这段时光。这么早，肯定还没有到下坝的车，而从另外一条路走，必须经过一段城乡结合部。这次回家，我听说这个地方屡屡发生命案。我希望我爹在天亮前不

要走这条路。但是，天亮以后独自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滋味也不好受。但我每次上学他都提出要送我，我不能说不让他送，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孩子，他就我这么一个“龙种”，对我寄予厚望。他虽然不知道硕士、博士之类的，但他要我把书读到头，读到没法读为止。他的一切言谈举止都在暗示我，我是他的生命，他的全部。

三

我的寒暑假生活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很少干活，因为没有我干的活。我们家的田不多，猪也喂得不多，但有四个半壮劳动力。四个壮劳力是家爷、家家（念“gāgā”，方言，“外婆”之意）、我爹和我妈。虽然我已经二十二岁了，但我家爷和家家才六十多岁。家家生我妈时，不到二十岁。家爷和家家只有我妈一个孩子，没有受到什么拖累，身体一直很好。

半个壮劳力是我祖祖，就是我外公的妈，今年八十多岁了，一辈子劳作不息，虽然早逾古稀之年，却很少生病，精神好得不得了，可以用“矍铄”两个字来形容。所以，我们家是标准的四世同堂。你说在这样的家庭里，还用得着我这个独孙子干活吗？享受他们每个人的宠爱都还要分个先后呢！不仅我不用下地干活，我妈也不用下地干活，她最多做做针线活，织织毛衣。我从小一直到高中时的鞋子都是我妈做的，我身上穿的毛衣也全是我妈织的，她甚至买回了一台缝纫机，尝试着给我做了几套衣服。这些活对我妈来说，与其说是干活，还不如说是打发无聊的时光。所以，与我们村子里的其他妇女比起来，我妈显得年轻白净多了，根本看不出来是个干农活的人。

我的寒暑假生活一般是这样开始的：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回家的当晚，四代人六口人一定要围着桌子，更确切地说，是围着我吃一顿热热闹闹的晚餐。桌上摆的当然全是我最爱吃的东西：猪蹄子肉，面广椒炒腊肉，洋芋粉粑粑，魔芋豆腐等等。如果我高兴，全

家人还会陪我喝几碗包谷酒。用碗喝酒是我们这里的习惯。包谷酒52°，几碗下去我就不行了，我不行了他们就不喝了。我让他们继续喝。家爷把碗朝桌子上一顿，说：红兵不喝了，我也不喝了。然后我妈也不喝了，家家也不喝了。这些年祖祖一年只沾两次酒，就是寒暑假我从武汉回来的时候。家爷每次给她倒酒之前都要问：祖祖，您喝不喝点？每当这时，祖祖就会慢吞吞地说：红兵回来了，喝点吧。家爷就给她找来一只最多只能装五钱的杯子，给她斟上。祖祖的这杯酒与其说是用来喝的，毋宁说是用来碰杯接受全家人的祝福的，或者，祝福全家人的。尽管祖祖每次只喝一杯酒，但这一杯酒总能坚持到最后全家人举杯大团圆的时候。

尽管我爹有哮喘病，但他很能喝酒。有时候他稍微喝得多了一点，我妈就会埋怨他。只不过我回来的这一顿酒，我爹喝多少，我妈都不说。但我爹也是有个度的，那就是我喝多少碗他就喝多少碗。不像我妈和家家，我喝多长时间，她们就喝多长时间。虽然时间一样，她们喝的酒却很少。

我最喜欢放寒假了，虽然在从宜昌到建城的十几个小时里，我冻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执着地喜欢。不仅仅是因为这顿热气腾腾的晚饭，还因为饭后全家人围坐在火坑边聊天时其乐融融的情景。

火坑屋里温暖极了，是冬天里我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每当我在学校里或回家的汽车上冻得浑身乱颤时，我就特别想念我们家温暖的火坑屋。火坑里烧的是我爹和家爷从山上挖来的树莛和树根，为了不让它们烧得太快，也为了积攒一些火粪作为来年的肥料，树莛和树根上面常常覆以厚厚的草皮和泥土，像一座小山。火坑的上方挂着密密麻麻的年猪肉，像黑夜中的热带雨林。祖祖、家爷和家家都有固定的座位。祖祖的座位是一把由篾片编成的躺椅，家爷和家家的座位是两把垫着厚厚布垫的藤椅，我爹、我妈和我则抓到什么就坐什么。我习惯坐在小板凳上，把手臂搁在祖祖，或家爷，或家家的大腿上，听他们漫无边际地聊他们认识的人和他们经历的事。

最温馨的时刻莫过于天快黑下来的时候，天空突然飘满了飞舞的雪花，火坑边的小桌上摆上了我妈刚炒出来的落花生和葵花。偶尔一个村民从我家门前的大路上经过，喊着我父亲的名字，问我是不是回来了。这时我爹就会用几乎能将冰块融化的热情回答：回来了，今天回来的，进来坐一下吧。那个村民说：不坐了，下雪了，怕雪下大了回不去了，二天再来吧（“以后再来”之意）。

最让我感动的时刻莫过于住在附近的大伯、二伯两家倾巢出动，约我找个时间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

最难消受的时刻是全家人坐在暖洋洋的火坑边对我嘘寒问暖。他们问得也太仔细了，问我从高坪到石埡子坐车要多久。我从宜昌一上车就睡得昏天黑地，除非被冻醒，根本就没关心过这从来没有出过伟人也没有出过什么名人的两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地方到底相距有多远。我已经哈欠连天、睡眼惺忪了，祖祖和家爷还在为我回来时是不是经过了落水洞而争论不休。我祖祖年轻时带着我家爷在这片深山老林里走过不少地方。他们最喜欢为一些地名争论了，比如，关于我从宜昌回来时是先经过桑园坝，还是先到石埡子这个问题，他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祖祖说：“肯定是石埡子。”

家爷说：“不对，应该是先到桑园坝。”

祖祖说：“有一年我带着你从高坪走到建城时，你才十二岁。你当然不记得。”

家爷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不知道从建城到高坪走了多少回，石埡子和桑园坝在哪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又比如，家爷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们这里要修铁路了，就跟我爹说了起来。说着说着，家爷和我爹就争了起来。

家爷说：“铁路肯定会经过三岔溪。”

我爹说：“怎么可能经过三岔溪呢？红岩寺都不经过。”

两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无法去核实，